·人物·

亲历新中国科普事业发展

——访章道义

尹传红

章道义简介

科普作家、评论家、活动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首席顾问。1930年3月生，安徽省来安县人。195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

曾任中国科协全国委员、普及工作部部长，中国科普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农函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委，科技著作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五个一工程奖”专家讨论组成员，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评委会秘书长、副主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长期规划战略研究课题组顾问

主编有《科普创作概论》、《科普编辑概论》、《科技写作十六讲》、《中国科普名家名作》、《公务员科技读本》等科普理论著作与丛书多种。在众多公开发表科普作品与理论、评论文章多篇。曾四次获得先进工作者与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老有所为，乐在其中

尹传红 章老，好久没见面了，首先祝贺您被中国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授予优秀老科技工作者突出贡献奖荣誉称号。在我的印象里，这应该是您退休后获得的第三个全国性大奖了吧?

章道义 谢谢！你说的没错。第一个是在我退休4年之后，1996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中国科协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和纪念奖牌；第二个是2002年12月在第三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被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三部委授予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和纪念奖牌。此外，我还作为先进集体的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尹传红 可见您是退而不休，仍在为科普事业奔忙啊。

章道义 忙是谈不上了，只能说是为科普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但这些付出确实也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日趋衰老，今后不大可能再做多少事情了。自己也确实到了应该好好休息的年龄了。

尹传红 恐怕您未必能够真正地闲下来吧?我知道，去年您又领头做了一件很受称道的大事，我指的是联名上书温总理，建议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加强科普宣传那件事。

章道义 事或许不算大，但事背后的意义大。据我了解，这件事的确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结果也不错。这要从2005年6月底说起。当时温家宝总理作了一次电视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报告很快就在报纸

收稿日期：2007-03-01

上发表了。

认真读过这份报告后我注意到，文中并没有提到科普应如何配合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没有提到要发挥中国科协的作用，而工青妇都提到了。于是我就考虑，是否可以给总理写封信，提几点具体的建议呢？在跟几位老同志简单碰过并得到响应之后，我执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同时联系14位科普界的代表人物，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并签名。总理看到信后很快就作出批示，认为建议很好，请发改委会同有关部委制定具体方案。

目前的情况是：发改委已会同中国科协反复磋商，并联合9个部委制定了一个具体方案。报请温总理同意后，已经落实了一笔启动经费，开始组织实施。

尹传红　致力于我国科普队伍和科普事业建设超过半个世纪的科普作家、评论家与活动家，健在的可以说屈指可数了。而像您这样亲历新中国科普事业发展历程、具有丰富实践与管理经验，并能提出理论见解和点子的“老科普”，我看也属凤毛麟角喽。

章道义　谢谢你的评价和抬举。套用一句老话说，真是“不敢当”啊。我想，一个人的作为或取得的所谓成绩，往往是在大形势的推动之下，由诸多主客观原因促成的，而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和努力。

在漫长的科普生涯中，我从事过多种科普宣传、编创工作，也多次深入到基层作过调查研究和组织指导工作，还在农村里从生产队、大队到公社蹲过点，也参与制定过一些全国性的科普规划，组织开展过一些全国性的科普活动，因此在科普工作上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

正是由于多年来坚守科普工作岗位，得到了多方面的实际锻炼，使我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普理论研究的第一手素材；结识了许许多多热心科普工作的科学家、科普作家、科普编辑和科学记者——从科技界的领导人、学术泰斗、科普大师到奋战在科普第一线的青年科普工作者，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和依重，有的还成为很好的朋友；加之多年来受党的教育养成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使我逐步具备了开创我国科普研究的基本条件，并有幸成为中国科普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人力、物力都很困难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能团结和依靠科普界的力量，取得了一批具有历史意义的科研成果。

走进科学普及局

尹传红　6年前，您撰写的长篇文章《中国科普：一个世纪的简要回顾》在《科技日报》上连载了26周，这种情况在我所供职的这张报纸是不多见的，由此也可见那篇文章的分量了。现在，可否请您简要回顾一下您从事科普工作的经历？

章道义　好的，就从自己的中学和大学时代说起吧。上世纪40年代，我先后在南京金陵中学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学习。前者是南京的名牌中学，教师、校舍和设备在南京都是一流的。校长每学期都要请几位学者名流来校讲演，主题有如人类如何飞上月球，如何修建三峡大坝，等等，这些名家讲演使我们的视野大为开阔；后者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农学院之一，农林学界的许多名人，都是金大农学院的校友，有的还当过我的老师呢。金大农学院一向实行教学与科研、推广相结合的教学体制，而技术推广和科学普及又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我在学生时代就受过一些科普与技术推广的熏陶。

尹传红　走上科普岗位是您个人的选择吗？

章道义　不是。1950年8月，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当时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兼做主任），由文委又分配到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从此，我就脱离农业系统，进入了教科文系统。这在我的同班同学中是唯一的一个，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其实，最初我是被分配到东北农业部门的，后来又把我改派华北——实际上是进了中央机关，脱离了农业系统。个中原因，想来是我做过学生干部，在“决定”我命运的老师眼里，似乎知识面要宽一些，活动能力也强一些，到一个新的非农岗位上，也许更能适应环境、发挥作用吧。

尹传红　设在文化部的这个科学普及局据

说规模相当可观，新中国的创建者的确很有眼光啊。

章道义 是的，科普局机关有4处1室，即组织辅导处、编译处、器材处、电化教育处和办公室，共50多人。下面还有4个直属机构，即中央科学馆筹备处、电化教育工具制造所、博物标本制造所和仪器制造厂，加起来有好几百人呢。不过，我在科普局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机构很快又做了调整。但是，我在科普局的这段经历，对我一生的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就在我报到后没几天，适逢“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我有幸在这个大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全国著名的科学家，聆听了他们的报告和讲话，受到很大鼓舞。

随后我又结识了两位启蒙老师：科普局局长袁翰青和我国科普先驱高士其。袁局长是闻名北平的三大民主教授之一，是一位学识、文笔、口才都很出众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长者，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学部委员。他在抗战期间曾任国立兰州科技馆馆长，对如何开展科普工作有自己的见解和实践经验。高士其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后来我有幸成为他的邻居和助手，受他的教诲和影响就更多了。

尹传红 您所在的组织辅导处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章道义 顾名思义，组织推动和辅助指导全国的科普工作。当时的组织辅导处有两个科(调查研究科、组织辅导科）和一个《科学普及工作》编辑部。我们的处长叫朱兆祥，他后来成了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宁波大学首任校长。当时我受他指派，负责组织全处同志的业务学习。例如，科普的方针任务、科普的主要形式与途径，以及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如何做计划，如何做总结，如何设计面向农村的大众科普展览和编写展览说明，等等。

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多学一些东西，并认真地研读了郭沫若、沈雁冰（茅盾）等领导人有关新中国科普工作的论述，从而很快地进入了角色，还养成了学习、钻研业务的好习惯。



在接受科技日报的采访（1999年）_黄志翔_摄

尹传红 在做组织管理工作的同时，有没有机会参与科普创作呢？

章道义 有啊。当时科普局正在主编一套面向工农大众的“科学小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局里有好几位中青年同志参加了这套书的写作。编译处的一位老大姐要我也写一本。在她的鼓励下，我就鼓起勇气学着写作，一本两万来字的小册子，花了我大半年的业余时间，在她指导下，终于写出来了，并于1952年初出版，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累计发行7万多册。

创作这本小册子为我后来从事科普编创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从此，写文章、编书、综合整理讲稿等就不那么犯难了。

志趣与追求

尹传红 应该说，您的科普事业是从文化部科普局的职业生涯起步的。我很想知道，后来您怎么又到了中国科协？

章道义 说来话长。1951年，文化部科普局与文物局合并为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只留下一个文化馆处做点科普工作，大量的科普工作则交给1950年成立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协会）组织、动员科学技术界去做。袁翰青局长当时兼任全国科普协会的常务副秘书长，那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他负责领导，朱兆祥处长也兼着科普协会的秘书处

处长。于是，在机构调整时就从科普局带了6位青年同志过去。我被分配到协会宣传部，负责几个宣传计划委员会的组织联络工作和科普宣讲材料的整理编写工作，以后又负责中央科学讲座的组织工作和讲稿的整理编辑工作，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供稿。

这些工作，使我在组织和宣传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锻炼。中央科学讲座的主讲人和宣传计划委员会的领导和成员大都是当时的热心科普工作的著名科学家和有关部委的副部长、司局长，有关院所的院所长，大学的校长、教务长，我经常和他们接触，聆听他们的意见和见解，受益颇多。他们的学者和长者风范，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思想作风，也对我很有教益。

尹传红　能不能举个给您印象最深的实例说一说?

章道义　全国科普协会主席、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梁希院士你知道吧？他是我国农林学界的先驱，曾任中华农学会与中国林学会会长、理事长多年，我是他在中央科学讲座讲演的责任编辑。他的讲稿不仅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文笔简洁流畅，而且很有文采，我几乎可以一字不改。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斗胆给他改了一句。在他讲到森林土壤中的水流速非常小，一年只流两公里时，我给加了一句形象化的比喻：比乌龟爬得还慢。校样送给他看时，起初他很不以为然，在文旁批了一句话：乌龟一小时能爬多远，一年又能爬多远，你计算过吗？后来，他自己算了一下，土壤中水的流速，一天只有5米多，确实比乌龟爬得慢，又同意把这句话保留了。

这件事使我深受触动：前辈科学家做事行文是多么的严谨、认真，想当然地大概齐在他们那里断然是行不通的。梁老是一位仪态端庄、表情严肃、彬彬有礼而又具有诗人气质、热情似火的长者，这从他的许多诗文中便可以感受得到。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而我刚刚二十出头，可谓是爷爷辈的老领导了。在向科学进军的年代里，我作为全国科普协会机关团总支书记，曾带领几十名团员和青年去东四梁老寓所拜访他，与他又一次亲密接触，他的人生经历、爱国热诚、敬业精神和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深深地激励着我们。

尹传红　回望50年前，人们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火红的年代，火红的科普。

章道义　没错。6年前你的同事赵雪就“科普前辈座谈会”采访我，发表文章时就用了这样一个标题：《50年代初我们干劲十足》。身处那样一个时代，谁能不受感染?

话说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及“制定1956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

接着，国务院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来领导制定科学规划的工作，并集中了400多位科学家来综合平衡。在这一过程中，为使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向科学进军及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重大意义。全国科普协会举办了新兴科学技术与世界科学技术新成就讲座，请参与制定规划的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黄昆等作报告，进一步扩大了这一举措在社会上的影响。各地团组织更是纷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引导广大团员和青年向科学进军。

尹传红　您自己的理想就是在那时候确立的吗?

章道义　是的。当时我作为全国科普协会机关团总支的书记，也积极地投身到这一行动中来：一方面组织团员和青年去访问一些科学家，如协会主席梁希、副主席陈凤桐等，学习借鉴他们的理想、志气与奋斗经历，聆听他们的教诲和嘱咐；一方面一个一个地引导帮助团员树立各自的奋斗目标，制定出各自的向科学进军的规划，并督促执行。

如郑文光当时已经开始创作科幻小说，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位知名的科幻作家，有的则希望能够成为像周建人那样的编辑家和作家，或高士其那样的科普作家和诗人，还有的则希望成为一名科普活动家和理论家，我就是这后者中的一个。这一活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坚持执行，但还是在一些有志者的思想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的人后来也基本上实现了

他的理想和追求，如你所熟悉的郑文光。

从“杂事”中集成

尹传红 您把自己的事业目标定位为科普活动家和理论家，可据我了解，几十年来您似乎干了很多“杂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章道义 也不尽然。职业和事业实际上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我看来，干好职业是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我的具体工作来看，的确很细很杂，可又不能不做，包括一些得罪人的事。从科普局到科普协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到科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科普协会合并为中国科协，我既从事过调查研究和计划与组织推动工作，也办过讲座，整理和编写过讲稿、广播稿，后来又编过书，写过稿，办过刊，编辑设计过挂图、幻灯片和小型展览，之前还在科普局举办的大型科普展览会当过解说员。之后，我又担任过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科教影片《巫师的骗术》的科学顾问，策划和组织过多种大型科普与青少年科技活动，并在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蹲过点，与农村干部和农村青年一起种试验田、种子田和样板田，办过农民技术夜校，面对面地为他们讲课，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与农民交朋友。

尹传红 听到过您的同辈朋友的评价，就是岗位上这些实际工作的锻炼，使您成了一名科普工作的多面手，这为您日后主持科普研究所的工作和中国科协普及工作部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提高了对科普方方面面的观察与评判能力。其实，杂事也能集成，集成也是一种创新啊。

章道义 撇开褒扬的成分，我要说，付出了辛劳和代价，一般总是会有回报的。科普有什么“大事”可做呢？不都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集合而成的吗？

在我的科普生涯中还有一段短暂的特殊经历。1961年，在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过程中，我一度负责出黑板报，经常用一些顺口溜、快板、打油诗来表扬好人好事。不料这点“才华”竟然也被县委组织部注意到了，于是在我劳动了半年之后就把我调到县剧团去协助编剧。

这个剧团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戏，唱腔蛮好听的，很受当地（山西临汾地区）农民群众的欢迎。我随剧团在农村巡回演出，接触到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村知识青年，深深地感受到农民大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求，也体会到基层文艺工作者的艰辛与喜乐。

我在初步掌握了它的各种唱腔和唱词的变化规律之后，与剧团的团长、导演合作，用半年时间，改编了一出旧剧，移植了一出新剧。这对我从事科普创作，如构思谋篇、设计情节、遣词造句、塑造人物、瞄准对象等也许有所借鉴。我还在干校里管过3年生产，这对我提高运筹、安排与组织、应变能力也所帮助。

总之，我是抱着事事留心皆学问的态度，干什么就学什么，看似无关的事物，内里往往也有相通之处。这也许就是我能比同时起步的一些同事、战友要多挑一点重担，也多付出一些艰辛的人生乐趣吧。

尹传红 听说您参与创办中国科普研究所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困难，付出了不少艰辛？

章道义 确实如此，很不容易。建所以后面临的两大矛盾：一是没有人员，二是没有房子。从科协普及部划过来的人员，也有一些是从事科普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如沈左尧、何寄梅、江一等，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很不错，有的还相当出众，但是这样的骨干太少了。

从外单位调，当时的单位所有制很厉害，你看中了，人家又愿意来的，单位就是不放，你也毫无办法。如科普作家陶世龙，对发展科普事业很热心，又有相当的创作、理论研究和组织活动能力，当时在武汉地质学院，并没有被十分重用。但你要调他，人家就是不放。因此，要调一个人，要里里外外做很多工作。加之，当时北京的户口、住房都难以解决，从外地调人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我和科普界的同志比较熟悉，往往不仅要由我提名，还得由我找他们谈话，做他们和他们单位的工作。如汤寿根、郭正谊、郑延慧、李元、齐仲等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个调进来的。也有的是自己要求来的，如郭以实，是

一位业余少儿科普作家，50年代曾在科普出版社工作过，我们早就认识。当时他在北京出版社主编《少年科学画报》，本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因想成为一名专业科普作家就主动要求来所，我们当然欢迎。

尹传红　您上面提到的这些同志，现在都已经退出工作岗位，有的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目前仍健在的，大多已是科普界的知名人士了，有的还很活跃，他们的名字和身影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这说明科普所当时确实吸引和积聚了一些人才。

章道义　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所党委书记梅光和科普作协秘书长麦林功不可没。他们不仅满腔热情的欢迎他们，还真诚的团结和依靠他们，为他们的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再说办公用房，就更是困难。在短短4年里，我们就搬了4次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一面进人，一面想方设法地开展工作。在4年中我们就办了八九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影响的大事。挑几件重要的说吧：

如依靠科普界集体的力量，系统深入地总结了我国科普编创工作的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论上来，主编出版了《科普创作概论》和《科普编辑概论》两种科普理论著作，受到了科普界和出版界的好评。

再如，邀请了几十位热心科普工作并富有思想见解的专家学者和初露头角的青年科普作家，如王梓坤、王国忠、符其«、谈祥柏、饶忠华、林仁华、卞毓麟等在北戴河开了一次科普创作研究计划会议，广泛地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在研究所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创作研究力量。

尹传红　北戴河那次会议的情况，我听许多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受启发和鼓舞。

章道义　接下来就是策划选编了一套科普佳作选丛书，对各类科普作品的题材、体裁和特色，以及我国科普创作的骨干队伍及其水平的大致状况，作了一次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筛选出一批可供初学者观摩借鉴的佳作，这对培养我国的科普编创队伍，开展进一步的深层次研究很有意义。

另外，还举办了几次全国性的科技写作与科普编创讲习班，为科普宣传培训了一大批业务骨干，并推动近百所大学开设了科技写作课程，之前，还组织了中国科学作家科学记者代表团一行9人去美国访问三周，回国后在众多报刊发表了50多篇文章，其中不少见闻、观感和提法是首次在我国见著报端。如《美国国会的科技参谋部》、《美国科教单位的自我宣传》、《美国大学的科技写作课》、《美国怎样培养现代化农民》、《美国的志愿者》、《在探索馆中探索》、《报纸编排的现代化与期刊化》、《与阿西莫夫的会见》，等等。

尹传红　您提到的这些文章我几乎都看到了。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很喜欢科普，特别崇拜阿西莫夫，所以对饶忠华和赵之前辈写的那篇《与阿西莫夫的会见》印象极深。

章道义　噢，我还记得跟阿西莫夫见面时的情景呢，那是主人——美国科学作家协会，应我们代表团出访前提出的要求，特地在纽约市科学作家协会与全美武力学会为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安排的一次会见。著名华裔物理学家、全美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教授亲自出面接待，我们都很兴奋，都想多跟她交谈交谈。不一会儿，阿西莫夫来了，因招待会的时间有限，就由饶、赵二位对科幻更感兴趣的团员，分头对这位科幻大师进行了一次专访。这事一晃已经26年过去，阿西莫夫也已经去世15年了。

亲历两桩大事

尹传红　科普作协的成立和科普研究所的创建，是科普界的两桩大事，作为一位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者，您能否谈谈当时的一些背景？

章道义　好的，就从“科学的春天”说起吧。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这一年的春天，被誉为“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科普既是整个科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继续，科学的春天当然也就是科普的春天。紧接着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中国科协及时于5月20日至6月5日在上海召开了有300多名科普作者、译者、编者，科

普美术工作者，科教电影工作者和科普组织工作者参加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与会者满怀激情地畅谈了自己从事科普创作的感受和体会，同时以极大的义愤揭批了“四人帮”破坏科普创作，迫害科普作家的罪行。

会议还对如何繁荣科普创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由著名科普作家和翻译家董纯才作了总结。上海和中央的一些大报及电台、电视台作了多次报道，并发表了评论文章。与会全体代表发起成立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筹委会，对各地科协的迅速复兴和随后掀起的全国科普热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就在这次会议上，一些代表提出，科普也是一门学问，要开展科普学的研究；一些代表提出，科普创作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要像文艺界那样培养造就一支专业科普创作队伍。这些意见当然很好，但如何落实，绝非易事。

尹传红 当时您是以什么身份与会？

章道义 麦林和我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划者，也是如何落实这次会议精神的主要责任人。我们既是这次座谈会的正副秘书长，又是中国科普作协筹委会的正副秘书长。因此，就不能不考虑代表们提出的那些问题。

也许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也许是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急迫心情，促使24个省、市、自治区科协以快马加鞭的速度，很快地就成立了当地的科普创作协会或筹委会，不少省市还创办了发表科普作品的刊物，又反过来促使我们加快筹备工作的进度。这样，我们就在第二年的8月，及时召开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颖超、姬鹏飞、陆定一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不久前刚刚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向全体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科协、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卫生部、文化部、国家经委、国家农委、出版局等有关方面的领导和热心科普工作的科学家，或陪同接见，或出席开幕式，或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一致推选茅以升、高士其为中国科普作协名誉会长，董纯才为理事长，王文达、方宗熙、叶至善、顾均正、贾祖璋、温济泽为副理事长，麦林为秘书长，我为专职常务副秘书长。担子仍然主要落在麦林和我的身上。

尹传红 科普研究所的创建跟科普作协的成立有什么关联呢？

章道义 科普界的这两桩大事应该说联系紧密，甚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一举两得的。

中国科普作协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编制。甭说养些专业科普作家，就是配备几名专职干部都很困难。当时科协的人事部门正在给国家编委写报告，为各个全国性学会、协会要一批编制，总数据说有三四百人，但能分给中国科普作协的最多也就是七八个人，仍然不能解决培养专业科普作家的需要。这时已到了1979年底，再拖下去，会议的热乎劲都要凉啦。而科普界对科普作协成立后的期望值很高，我们岂能无所作为？

于是我就把作协面临的这个困难向协会名誉会长高士其作了汇报。他听完我的汇报后，激动地举起双手说，我来呐喊。

刚好不久前，小平同志就任全国政协主席之后，曾派政协的两位同志去看高老，对高老说，今后有什么困难或建议可以直接给小平同志写信。于是，高老就要我为他起草一封致小平同志的信。我考虑，既然要惊动小平同志这样的大人物，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不能就事论事，只解决一个科普作协的编制问题，而应当从发展我国的科普事业，提高我国的科普理论和创作水平，培养造就一支可享誉世界的科普理论与创作队伍的高度，提出一个与高老身份相称的建议。

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和高老谈了，高老欣然同意。于是我就利用新年的两天假期，写出了那封建议成立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的信，送请高老过目。高老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改了几句话，说：“好，抄好后送我盖章发出。”我就请科普图书馆的王惠兰同志带回家去抄写，并嘱咐她不要让别人知道。

尹传红 做好事为什么还要保密？

章道义 这也是件越级“通天”的事啊，上面可能批，也可能不批。知道的人多了，七嘴八舌往往坏事。其实，就连麦林同志我也没

有告诉她，以免使她为难。两天后，惠兰同志把一封缮写得工工整整的信交给我，我当即送给了高老，由高老的秘书发出。这时已是1980年元月8日。

这封信发出后仅仅10天，小平同志就在元月18日作了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批文对高老的具体建议，未置可否。但这么快就批给当时主管科教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阅处，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支持的态度。方毅同志收到后，也很快地在元月23日作了批示。他明确赞成高老的建议，希望能早日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的专业科普人才，尽快地提高我国的科普水平。但机构人员要精，主要应选调科学家。

尹传红　当时科协领导是什么态度呢？

章道义　批件下达科协以后，科协的领导也很支持，要我以中国科协的名义，正式给国家编委写报告。我和麦林及人事处的同志商量后，遵照方毅同志的批示精神，将原建议的150人编制，减少为100人。机构则仍为：创作室、研究室、外国科普研究室、《科普创作》编辑室、科普图书资料馆和承担所会两方面秘书后勤任务的办公室，与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合署办公。也就是对外两块牌子，对内一套人马。

尹传红　这样，也就一举解决了开展科普学研究和选拔培养专业科普作家的问题。

章道义　对。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编委很快地就批了下来，比其他协会、学会早解决了一两年。但编制的人员名额则拦腰砍了一刀，给了50名，其余50名，答应今后事业发展了再给。

科普创作研究所有了户头，有了编制，科协就任命一个领导小组着手筹备。由于它将从普及部独立出来，因此就由当时的普及部部长黄汉炎任组长，成员为梅光、麦林和我。随后，又任命梅光为所党委书记，我为副所长。所长想请一位科学家来担任，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我建议就请高老担任名誉所长。这再合适也不过了，科协领导表示赞成，于是就任命高老当名誉所长。

随后，我们就积极地进行筹备，并决定从1980年10月1日起，开始启用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印章。也就从这一天起，中国的科技研究队伍中，又多了一个新型的研究机构，也是一个唯一的国家级科普研究机构。这就是创建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的由来和背景。

到了1989年下半年，中国科协调整机构、干部，调我回机关，任普及工作部部长。三年后，又任命我兼任科普所所长，并将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的领域就更宽了。

交流与缅怀

尹传红　您在担任中国科协普及工作部部长期间和退休之后，为推进我国科普事业还做过些什么贡献？

章道义　贡献谈不上，事情还真不少，说来话长。这里只能择要点到为止。如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农村科普工作；支持推动厂矿企业科协开展"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支持推动城市科协开展科普之春、科普之夏等科普宣传周活动；支持推动全国性学会开展科普宣传和培训活动；开创和参与多种科普评奖活动，如优秀科普图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的科普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兴办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支持和指导地方办好科技报。

还有，在中国科协干部学院讲授科普课程，为地方科协、全国性学会和科普事业单位培训科普干部；以及为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制造舆论、提供建议，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为振兴科普事业接受众多媒体的多次采访，等等。

在对外交往上，早在1979年我就开始不断地考察研究诸多发达国家的科普工作、科普设施和科技教育，并接待了众多外国科技与科普团体和科普作家、科学记者的来访。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尹传红　说到对外交流，听说您还应约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杂志，写过一篇介绍中国科普的文章？

章道义　那是1989年，在我参加了美国科学促进会和美国Sigma Xi科学研究会召开的"让

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国际研讨会”之后，针对西方科技界的某些观点而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科学家与公众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这篇文章受到了杂志主编的好评，以英文和法文两种版本在巴黎同时发表，以后又被多个国家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中文版也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引起了一些外国朋友和外国科技组织的兴趣。

尹传红 多次在报刊上看到您为纪念我国著名科学家，特别是他们的百年诞辰而撰写的长篇文章，您能说说您的想法和感受吗?

章道义 是的，我写过纪念周培源、董纯才、高士其、贾祖璋等老一辈科学家和科普作家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写周老的那篇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被翻译成英文在中国科学院的英文版院刊发表。我还写过缅怀梁希主席的文章和评介《竺可桢全集》的文章。也编过他们的画册和选集。

《中国科普名家名作》一书中有几十位前辈科学家，如吴介平、卢嘉锡、钱伟长等院士的业绩介绍和科普作品也是我撰写和选编的。因我在中国科协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对他们比较了解，也很有感情。如周老、高老曾为早日恢复科协、学会和开展科普工作做出过巨大贡献，我作为他们的助手也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并因此在1977年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荣誉，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正是由于这种共同奋斗的经历和友情，我很乐意为他们做些事情，而他们的情操和精神也正是今天社会需要大力弘扬的。

尹传红 由于《科普研究》的篇幅有限，还有很多业绩和见解未能请您介绍，这次访谈就此告一段落，希望以后有机会再专题采访您。

章道义 谢谢你和《科普研究》的关注。

作者简介

尹传红，《科技日报》经济特刊副主编，主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Email：asimov19790319@yahoo.com.cn

(上接第66页)

[18] NELKIN D. Selling science [M]. New York：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7：79

[19] BROKS P. Media science before the great war [M].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6：128

[20] 王旭. 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 [M]. 长沙：岳麓书社，2003：5，8

[21] BASALLA G. Pop science: the depiction of science in popular culture [M] // HOLTON G, BLANPIED W A. Science and its public: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oston: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作者简介

石顺科，副译审，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主任；Email：shishunke@yahoo.com.cn

欢迎订阅《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享誉天下50年，影响了几代人。她的多彩栏目或许令你在快捷的生活中感到片刻轻松：读图时代图片弥足珍贵；热点关注直击时事浪花；科考者的最酷之旅让你身未动，心先行；探索历程启人智慧；身边人物令人动容；万象奥秘则褪去科学的严肃外衣，以朴实的文字解释万物之理。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或汇款至本刊编辑部邮购。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 邮编：100081

联系人：王晓明 电话：(010) 62155630